

# 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的形与神

李雪 查洪德<sup>1</sup>

**【摘要】**元代出现了一批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章，这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带给传记文学多方面的新变，使之展现出新的形与神。形，是可见的，可理解为形象性，如文章选材之独特，适应独特内容的传记写作手法之引入，描写的异域风情与色目人特异的形象与性格。神，指可感的，即文章中体现的精神，包括多元文化的彰显，新的文章风貌神韵，破体求新的文学追求，以及多族士人文化认同中体现的大元气象等。这是中国传记文学史上独具价值又长期被忽视的部分，值得认真研究。

**【关键词】**元代传记 多元文化 异域风貌

元代出现了一批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这部分文章，从内容到风格，以及体现的文学与文化精神，都是元代文学中特别值得关注的部分。20世纪40年代，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元代部分说：“独吾诵元人诗文集，其中碑传所志勋臣元僚，克城数十百，莫非我汉族暴霜露、斩荆棘之所垦辟以世世长子孙者也。杀贼几百万，莫非我汉族同仇敌忾之为国干城者也。”他抨击这些碑传的作者：“誉凶人以为元勋，侈屠戮以张德威，执简以书，非异人任。”<sup>1</sup>他的态度，今人已不认同，但他很早就特别关注了这部分文章，说明他有敏锐的学术眼光。这是元代文学中特别值得研究的部分。本文的研究对象即为元代文学家撰写的色目人行状、神道碑、墓志铭、墓碣、墓表等，以往归为史传，本文从文学视角审视，这部分文章是中国文学史上很独特的部分，它为中国文学史增加了奇异色彩，并带来了传记文学的一系列新变。

## 一、异域记述带来的破程式书写

唐代韩愈的碑传文为后世树立了典范，到宋代已形成基本写作模式，经元代潘昂霄《金石例》的总结概括而为一般作者所遵循。元代以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也同样遵循此模式。但由于色目人来自西域，具有与汉人不同的族群归属、成长经历、思想观念，所以以他们为传主的传记文又在具体内容上呈现出独有的特色，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族属起源的奇异叙事，色目人物特有的归附史事，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异域特性。这些独特内容的写入，突破了原有的史传写作模式，使这部分文章从内容到笔法都呈现出新的风貌。

### （一）族属起源的奇异叙事

传记文的一般写法是在文章开头讲述传主的家世族望，很多汉族人物传记文在记述传主家世时，往往会攀附大族，追述历史名人为远祖，这已然成了一种常用的路数。色目人的传记文同样遵循这样的“套路”，但在模式化叙事中却注入神奇色彩。

在色目人传记文中，关于族属起源最常见的写法是简单记录其家族所属族群。如李益立山祖先是沙陀贵种：“其先系沙陀贵种，唐亡，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河西人。”<sup>2</sup>高唐忠献王阔里吉思“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sup>3</sup>。孟速思为“别失八里人，世出畏吾儿族”<sup>4</sup>。大都朝的曾祖秦国公伯益赫是国中贵臣：“别石拔里人也。世令德，为有国中贵臣。”<sup>5</sup>伯德那为“西域班勒斡人，世为大家，本俗以族显”<sup>6</sup>。亦辇真为“伟吾而人，上世为其国之君长”<sup>7</sup>。燕只不花为“辉和尔氏，居哈喇和卓，为北庭大族”<sup>8</sup>。赵世延祖上为“雍

<sup>1</sup>作者简介：李雪，南开大学文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后（天津 300071）；查洪德，南开大学杰出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天津 300071）

<sup>2</sup>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代传记文研究”（20CZW02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元代各民族文学交融背景下元诗的发展与流变”（18ZDA34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异质文化的介入与元代传记文的新变”（2020M680031）

古氏，云中世族”<sup>9</sup>。阿塔海牙为“畏吾尔氏，世为高昌望族。祖玉龙阿思兰都大，都大，华言巨室也”<sup>10</sup>。康里回回“世为康里部大人族”<sup>11</sup>。由此可见，这些色目人的祖先或为贵臣，或为首领，或为部族大家，总之，都拥有显赫的家世。这种对族属起源的叙事，一方面因循了汉人传记文攀附大族的叙事模式，另一方面展示了色目人所特有的与汉人大为殊异的族群归属情境。

欧阳玄撰写的《高昌偃氏家传》详细地追溯了偃氏的族源：“高昌者，今哈刺和绰也。和绰本汉言高昌，高之音近和，昌之音近绰，遂为和绰也。哈刺，黑也，其地有黑山也。今伟兀称高昌，地则高昌，人则回鹘也。高昌王有印，曰‘诸天敬护护国第四王印’，即唐所赐回鹘印也。言‘诸天敬护’者，其国俗素重佛氏，因为梵言以祝之也。噉欲谷子孙既世为伟兀贵臣，因为伟兀人。又尝从其主居偃鞑河上，子孙宗噉欲谷为始祖，因以偃为氏焉，以河名也。”<sup>12</sup>将偃氏的先祖追溯到唐代，展示高昌偃氏自唐以来便是高门大族，同时梳理了高昌偃氏的起源发展。

但很多色目人物传记的族源不是史的追述而是富有神奇色彩的虚构传说。虞集为帖睦儿补化家族撰写的《高昌王世勋碑》，叙述高昌王世家的来历，追溯其族源：“畏吾而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秃忽刺，曰薛灵哥。一夕，有天光降于树，在二河之间。国人即而候之，树生瘿，若人妊身然。自是光恒见者。越九月又十日，而瘿裂得婴儿五，收养之。其最稚者，曰卜古可罕，既壮，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为之君长。”<sup>13</sup>这便是高昌王家族之来历，祖先由树而生，类似于中原地区的远古神话传说。

## （二）特有的归附史事

归附史事是色目人物传记特有的内容，从文章写作视角看，也是不同于传统传记之处。13世纪初，蒙古军队以破竹之势横扫欧亚大陆，在蒙古军队西征东讨南伐的进程中，色目人率先归附，在他们的传记文中记述了各族群的归附史事，多具有故事性。

汪古部阿刺兀思剔吉忽里审天命之攸归，决议归顺太祖（成吉思汗）：“太祖圣武皇帝起朔方，并吞诸部。有国西北曰带阳罕者，遣使卓忽难来谓忠武（即阿刺兀思剔吉忽里）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汝能为吾右臂，朔方不难定也。’忠武素料太祖智勇，终成大事，决意归之。部众或有异议，忠武不从，即遣麾下将秃里必答思，赍酒六榼，送卓忽难于太祖，告以带阳之谋。……上诏忠武：‘异日吾有天下，奚汝之报？天实监之。’且约同征带阳，会于某地。忠武先期而至，既收带阳，天兵下中原，忠武为向导，南出界垣。”<sup>14</sup>作者阎复并没有直接写汪古对蒙元王朝的贡献，而是先从阿刺兀思剔吉忽里积极响应成吉思汗的统一大业，力排众议，向成吉思汗送达乃蛮部欲起兵的消息写起，使我们看到阿刺兀思剔吉忽里选择归附的审时度势、远见卓识。

康里部的归附更具故事性。一位母亲带领两孤子投奔太宗：“康里，古高车国也。我太祖皇帝亲征而略其地。其国之近属有二孤子，曰曲律，曰牙牙，其母臧密古麻里氏，贤而有识，以二子置褚中，负以橐驼而来朝，则太祖已宾天，乃以二子献于太宗曰：‘此吾国之遗胤也，不可为人所得而辱于奴隶，敢以来归，幸它日为天子使。’上怜而抚育之。”<sup>15</sup>没有英雄事迹，没有首领率领，而是一位刚毅果敢的母亲，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将两孤子放在口袋里，负以橐驼而来归。这是一则英雄母亲的故事，她决定的的是一个部族的命运。

有的归附故事则具有戏剧性情节。高昌偃氏佻理伽帖穆尔在本国受到冤屈，不能自白，于是归附蒙古：“佻理伽生而敏慧，年十六袭国相、答刺罕。时西契丹方强，威制高昌，命太师僧少监来临其国，恣睢用权，奢淫自奉。王患之，谋于佻理伽，曰：‘计将安出？’佻理伽对曰：‘能杀少监，挈吾众归大蒙古国，彼且震骇矣。’遂率众围少监。少监避兵于楼，升楼斩之，掷首楼下。以功加号佻理杰忽底，进授明别吉，妻号赫思迭林。子弟以噉欲谷之后，世为其国大臣，号之曰设，又曰沙尔，犹汉言威魄也。未几，左右有疾其功者，谮于王曰：‘少监珥珠，先王宝也，佻理伽匿之，盍急索勿失。’王怒，索珠宝甚急，佻理伽度无以自明，乃亡附国朝。”<sup>16</sup>这里建构了一则失意英雄出走故国归附蒙古的故事。佻理伽帖穆尔有勇有谋，先是在高昌与契丹的征战中献计杀少监，在少监避兵于楼时，又能升楼斩之，掷首楼下，立下大功。无奈遭人嫉妒，受到陷害，无以自明，于是归附蒙古。

色目人归附蒙元，原因不同，方式各异，这些后来成为元朝能臣强将的各族群的归附史事，由传记文作者打破固有写作模式，构思、建构、书写，将相关故事呈现于传记文中。

### （三）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异域特性

外貌等形象描写非碑传文的常规内容，但色目人来自西域，其外貌特征、性格特点往往被传记作者着意表现。与汉人传记相比，也具有其独特性。

在色目人传记文中，色目人的外形大多身材魁梧，有些蓄有胡须，骑射、膂力、拳术和行军布阵的谋略是颇受看重的才能。如赵世延的祖父按扎尔“智略沈雄，弓马绝世。未冠，材器已显。攻城略地，所向无前”<sup>17</sup>。马庆祥“姿貌魁杰，以志气自负，善骑射而知书，凡诸国语言文字，靡所不通”<sup>18</sup>。撒吉思“风仪魁岸，识度宏廓，莅事宽猛适宜”<sup>19</sup>。贯云石“公生，神采迥异。年十二三，膂力绝人，善骑射，工马槊”<sup>20</sup>。速哥察儿“体貌魁伟，器识英迈。少亲行伍，长益精练。器甲坚整，驰骤劲锐，应变赴急，奋不顾身”<sup>21</sup>。哈珊“长身美须髯，辨给而明于事物，沈谋有威，知本国文字，兼长骑射”<sup>22</sup>。月鲁哥“美髯长身，风度高凛，都人望之，固已畏爱之矣”<sup>23</sup>。这些传记文在描绘色目人的外貌特点与性格优长时，虽然用词不同、角度各异，但主要特征是类似的——形貌、个性不同于中原人。

叙述传主的成长经历是传记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已经形成的固有模式中，传主多少而聪敏、长而俊迈，但也有不同于中原人的特质，勇武是其种族特长。然而居于中原，他们也改变气质，随俗而化，转而习文，学圣人之道。迈里古思“自幼有奇气，善击搏技，既而自悔曰：‘伎勇有敌，圣贤之学无敌也。’遂从师，通《诗》《易》二经，以《诗》登进士第”<sup>24</sup>。很多色目人自小便是文武双全。色目人比蒙古人有更高的文化水准，并受到蒙古的信赖，先于中原士人成为蒙古政权的有力支持者，使他们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地位，其中特别优秀者在成长经历中与帝王有诸多联系。马月忽乃“年少辞容端敬，宪宗嘉赏之，命赞卜只儿断事官事”<sup>25</sup>。孟速思“幼负奇质，年十五，尽通本国书。太祖闻其名，征至阙下，一见大悦，曰：‘此儿目中有火，他日可大用。’”<sup>26</sup>安藏“九岁，始从师力学，一目十行俱下，日记万言。十三，能默诵《俱舍论》三十卷。十五，孔、释之书皆贯穿矣。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sup>27</sup>。亦纳脱脱“少从其兄斡秃蛮猎于燕南，斡秃蛮使献所获。世祖皇帝见其骨气沈雄，步履庄重，即命入宿卫”<sup>28</sup>。色目人在元代地位高、受优待，在他们的成长经历中除了天赋异禀外，自幼就能与皇帝接触并受赏识也是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这也是其传记文内容独特的一个方面。

在元代，由于色目人的特殊境遇，他们的异域特色在传记文中被书写、被记忆，造就了传记文内容的独特性。到了明初，一部分色目人远走西北，离开中土，一部分色目人融入汉人，便少有这样的传记文出现。这些赋有异域特色的书写内容蕴含着丰富多元的文化，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元代色目人传记文的独有价值。

## 二、多样化手法之引入

早期的史学著述，如《左传》《史记》等，兼具史学与文学价值，今人称之为史传文学。随着史著征信意识的增强，虚构与想象成分渐少。唐代韩愈树立的碑传类文章典范，主要记述传主的生平、履历、德业，以及家世与子孙情况，更少虚构与想象。元代色目人传记则明显不同，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家世与生平往往富有传奇色彩。适应其写作需要，多种写作手法被作者拿来运用，于是色目人物传记在文化精神上也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特点。

### （一）虚构故事的融入

受宗教与民间信仰的影响，色目人多相信神灵的存在，相信人死而灵魂不灭，信奉万物有灵。基于这种信仰，他们书写的传记文中融入了很多有关鬼神、灵异动物的异事，具有明显的虚构性。以陆文圭为燕只不花撰写的《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为例，燕只不花曾督建大都城，出巡临漳等地，官至海北广东道肃政廉访使，广东道宣慰使、副元帅。为官之时，讨伐

剧贼，访民疾苦，除害兴利。这篇墓志铭记载了他逝世时的情形：

一日感微疾，起居笑语如常，顾左右索酒，举觞一饮而酹曰：“善藏之，明当复饮。”翼日，扶坐榻上，呼长幼来前，再酹一觞，遍酌以赐，如叙诀状。使人侦视榼楼漏刻，日仄未，曰：“吾可以行矣。”颜色不变，翛然而逝，延祐元年七月十七日也。是日，命圉人馭所乘马戒駉从，若将出者，家人疑之。已而，市人欢曰：“吾见公由城西门去矣。”呜呼异哉！<sup>29</sup>

燕只不花似有预感，面对死亡从容不迫，对家中长幼一一安排后事，此事已见奇异，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去世前命人准备马匹，逝后市人看到他由城西门离去，更增加了传奇色彩。色目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在这里体现出来。生前丰功伟业，死后翩然而去，这个小故事的加入让燕只不花的形象更为丰满，也使得一代功臣形象更显神异。

高昌偃氏，世代为高昌贵族，蒙元时期归附成吉思汗，居于中原后汉文化成就颇高，一门九进士，有“三节六桂”的美誉。欧阳玄为其家族撰写的《高昌偃氏家传》，在追溯其远祖时记载了偃文质五世祖克直普尔驱水寐的故事：

初，兵出阿忽尔河，河水素湍急，俄而水止，国俗以为水寐。占者曰：“祷之，必有应。”公以裳盛水，祝曰：“愿子子孙孙勤劳王家，其炽如火，其续如绳，以忠以孝，永保令名。”言讫，以水洒河，河水湍流如初。<sup>30</sup>

他的祈祷能有如此驱寐神力，说明他是一位非凡人物。欧阳玄接着又写道：

尝盛暑袒跣卧大树下，鸚鸣树上，心恶之，揽衣起。且靴，鸚下爪靴者三，方怒提之，毒蛇自上堕地，赖鸚免于螫，戒世世子孙勿杀鸚。<sup>31</sup>

因鸚的再三提醒而免于难，是鸚的护卫还是冥冥中神的护卫？这样的神异故事增加了传记的神奇色彩，也神化了传主，他是一位超凡的奇人，所以，他的后代才英杰辈出。如此，为高昌偃氏的家族历史罩上了神异的光环。

亦璘真，畏吾儿人，字仲宏，曾任义乌达鲁花赤，“敏而练，明而察，劳而无倦，仁恕而有容”<sup>32</sup>。胡助《达鲁花赤亦璘真儒林公去思碑铭》记录了传主亦璘真祈雨灭火之事：

盛夏亢旱，原田告病。公斋戒，遍祷神祠不应，则露跣稽首以吁天，七昼夜不辍，雨乃时降。火起市中，势炽甚，莫知所措。公直火所向，衔哀祷之，解衣投火中，火乃扑灭。<sup>33</sup>

简短的一段文字包含了两件事：一则传主亦璘真伤身祈雨，诚意感动上天，雨也随之降下；二则灭火，胡助用一连串的动作——直、祷、解、投、灭，将此事交代清楚，寥寥数语便可以看出传主的机智勇敢、舍己为民，火势猛烈，却被亦璘真仅以衣物扑灭，诚心之下如得神助。

这些故事，无论是神显灵，还是鬼作祟，都是在色目人信奉神灵实有、万物有灵、人死而灵魂不灭的观念下产生的，在现在看来，充满虚构性与神秘性，作传者在传记中插入这些故事，充满传奇意味。神异，是色目人物传记营造的效果之一。

## （二）梦境之虚拟

在色目人物传记中出现了很多梦境描写，其中的梦境或具有指示、提供线索的作用，或包含着去世之人未完成的心愿，或可以治愈疾病。

丁鹤年是元代著名诗人，“其祖入中夏，世为显官”，父亲歿而葬武昌，由于兵祸，父墓尝被发掘，母亲也在兵乱之时逝世，

由于村落荒废，父老沦丧，不知母亲葬于何处，丁鹤年遍询幸存之人，无人知晓。绝望中，从梦境得到启示：

惟作母主，蚤暮拜母主前。求五旬浹有报，拜至七日，夜梦母氏出高堂中，鹤年遽牵母衣恸哭，以恸即寤。晨起，邻老杨重者至，云吾昨夜梦子之母氏堂宇间，自内出以酒肉见赐，与三人同食饮，内一人不御也。鹤年以梦母氏与邻老同，所梦堂宇皆在旧业之西又同，因具畚鍤偕往，徘徊顾视，见平陆上有陷下者，鹤年意谓吾闻母葬时无棺槨，下辘土砖，上覆败舟板，人与板腐尽乃尔，兹迨可启而观歟？遂陈肉酒以祭，祭毕，剔其土，骨果见。板仅有松节，土砖亦具，良在是矣。<sup>34</sup>

这是乌斯道《丁孝子传》的记载。作者将梦境描写得十分详细，就像实有发生一样。感梦也是精诚所至。

姚燧为李恒写的《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其中的梦境情节神秘而离奇。李恒伐南宋，征交趾，英勇作战，年仅五十薨思明州。他死后仍不忘其亲，于是托梦给太夫人：

公（即李恒）则再见梦太夫人（李恒之母）曰：“儿今死战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梦如是，岂诚然耶？”夫人（李恒之妻）始情告，曰：“妇恐无以安吾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位哭服丧。呜呼，死而精魄犹惓惓其亲，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sup>35</sup>

李恒战死沙场，其妻为不使婆婆忧思伤心，没有将实情告知。而李恒身死，精魂依然眷恋母亲，再见于梦。梦中李恒之语透露着不舍，太夫人之语表达着悲痛，母子情深令人感动。与之类似的梦境还有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中合刺普华于逝去之夕托梦给夫人：

（合刺普华）曰：“广寇之乱，吾死矣。”言已，乘云而升，夭矫如龙，径西北而去。知事辘闰、张德亦梦城门有金榜，合刺普华衣金甲指麾其中，谓曰：“吾今治此，烦若二人为功曹。”翌日凶讣至，俄而闰、德相继死。时群寇未息，官军追捕，邦人往往见其乘骖督战，或闻空中隐隐金鼓声，咸惊异以为神，绘像祠之。<sup>36</sup>

合刺普华，高昌偃氏，偃文质之父，在蒙元南伐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上面简短的一段文字涵盖了四件异事：其一，合刺普华托梦告诉夫人自己去世的消息，而后乘云而去；其二，辘闰、张德梦合刺普华之魂招二人共同为官；其三，辘闰、张德二人相继随合刺普华逝去；其四，在合刺普华去世之后，邦人见他乘马督战，甚至有人还能听到金鼓之声。四件事，件件神奇，融合了梦境、鬼魂和当时人们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忠臣良将，盛年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扼腕痛惜，于是作者使其在逝世后灵魂仍得以征战沙场，统帅一方。

在元代的人物传记中，还有一些梦境情节是写生病之人，或因子孙孝心感召，或因自己的德行感天动地，一梦便病愈，这种现象无从解释。如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中的阿尼哥“忽病。中使宣问踵至，而病益甚。乃梦游钧天帝所，下憩居庸之巔，四天女饷以食，食已，曰：‘公可归矣。’既寤，沉痾顿失”<sup>37</sup>。这些故事虽然梦境各有不同，但是情节却大同小异，在德行的感召之下，病人或其亲人梦神异之人、神奇之事，醒来病愈。

在古代，占梦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在天子那里会成为“授命之符”，于大臣可能会成为一种精神武器，于普通人而言更多时候起到的是一种指示与预示作用，作传者将千奇百怪的梦境写入传记，塑造了传主的高大形象，这些梦境被描述得曲折离奇而具有戏剧性，增加了色目人传记的传奇色彩和文学性。

### （三）“悬想”细节

钱钟书在《管锥编·左传正义·杜预序》中曾说：“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sup>38</sup>在历代史传文献中，这样

的叙写时有所见，特别是一些细节描写，确有出自史家“悬想”者。一些色目人物传记中的事迹写得丰富而传神，细节描写细致入微。

黄潜《广东道都转运盐使赠推诚守忠全节功臣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高昌郡公谥忠愍合刺普华公神道碑》一文中，记载了合刺普华英勇战死之事：“会朝廷有事占城，属公出护饷道。行次惠之博罗，值剧贼欧钟横截石湾，据其阨塞，势猖獗甚。公慨然语其众曰：‘馈重事，苟有退缩，必误军需。’即身先士卒，力战矢尽，而马被数创，犹徒步搏贼，格杀数十人，竟以众寡不敌见执。贼欲生之，使为主帅，公骂曰：‘吾天子贵臣，出将使指，宁能从汝蛮贼反耶？’贼知不可屈，公遂遇害。”<sup>39</sup>两处语言描写彰显其不畏艰难，身先士卒，将生死置之度外，“力战矢尽”，“马被数创，犹徒步搏贼”，细节描写寥寥数笔，将战争场面推向了高潮。这段记述主要是写合刺普华忠心为国，不屈而死。作传者设置情节，增加细节，更显合刺普华的英雄形象。

创兀儿（土土哈之子，亦封句容郡王），多次平定诸王叛乱，足智多谋，骁勇善战。大德元年（1297），“帅师逾金山，攻八邻之地。八邻之南，有大河，曰答鲁忽，其将帖良台阻水而军，伐木栅岸以自庇。土皆下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军矢不能及，马不可进。王即命吹铜角，举军大呼，声振林野。坐土不知所为，争起就马。王麾军毕渡，涌水泊（拍）岸，木栅漂散，因奋师驰击，五十里而后止。尽得其人马庐帐”<sup>40</sup>。在这场战役的描写中，作传者先写作战环境、敌军的作战策略，使创兀儿一方“矢不能及，马不可进”。在如此情形之下，创兀儿计高一筹，使敌军自乱阵脚，不攻自破。大德五年（1301），“都哇之兵西至，与大军相持于兀儿秃之地。王又独以其精锐驰入其阵，戈甲戛击，尘血飞溅，转旋三周，所杀不可胜计，而都哇之兵几尽。武皇亲见之，曰：‘力战未有如此者。’”<sup>41</sup>战斗的激烈与残酷全靠细节描写显现。作传者虞集又用武宗的评价，侧面展现出创兀儿在战场纵横驰骋、以一当十的英姿。虞集在对两次战争的描写中营造环境，渲染气氛，突出细节，又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令创兀儿的英勇果敢、骁勇善战立于目前。

星吉，河西人，至正十二年（1352）任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此时红巾军四起，湖广地区已经陷落，江西被围，“贼巢据彭泽，公欲攻之，而江州仓无一日粮，乃谕民输财贖士卒，俾惟恭守小孤山。而自驻鄱阳口，扼江湖要冲，以图恢复。然乱已久，湖广江浙多败，江西亦无援助者。转战六百余，所将兵日衰耗困疲，财粟亦且殫匮。或请去就食东南，图再举。公曰：‘吾受命守江西，此江西地也，死则死此，去将何之？’”守土尽责，他已抱定必死之心。在危急之中，迎来决战时刻：

九月二十日，贼知公兵食俱竭，帅大船载苇蔽江而下，杜上下流，纵火夹攻。公麾兵殊死战，死且尽。从子伯不花将亲兵数千入战，亦死。公犹坚坐大呼曰：“杀贼！杀贼！”俄而贼射公，中目，仆舟中。贼素识公名，不忍害，輿置密室中。明旦，少苏，贼馈食，公卧叱去。或以刃胁公降，公骂曰：“狂贼，我国之大臣，恨不能杀尔，而为尔获，命也，何谓降为？”大骂不已。贼终不敢害，环卒守公。凡不食九日，忽自力起，北而再拜曰：“臣力竭，不能报国，敢不死以辱命？”言毕而绝。<sup>42</sup>

星吉率领将士殊死搏斗，浴血厮杀，叱咤沙场，明知大局已定，但仍怒吼两声鼓舞士气，场面十分激烈。面对威逼利诱，宁死不屈，英勇无畏。对星吉这段事迹的记述如此生动，其中动人的情节、传神的细节，恐怕多出自合理的推想。

在元代，很多色目人跟随蒙古军队南征北战，成为著名的军事将领，他们的事迹功勋也多在战场上，作传者为歌颂他们的英勇事迹，设置情节，描摹场面，很多并非当时现场的记录，而是靠想象去填补。作传者为传主作传，其材料多来源于传主的亲人朋友，作传者依托这些材料组织、建构，写成我们看到的传记文。传记文为纪念追思逝者而作，最终成文要为家属认可；从家属的主观意愿而言，他们更倾向于使被书写者的形象高大而完美；从客观情境而言，这些色目人信仰万物有灵，具有树神崇拜、动物崇拜等观念，他们又是崇拜英雄的族群，一些在我们看来属虚构、夸张的事件，在他们看来是确信实有其事的。作传者在写作中，在总体纪实的基础上穿插进虚构的传说，补充了合理推想的细节，增强了传记的传奇色彩与文学性。元代传记文也因此展示出新的风貌神韵。

### 三、色目人传记体现的文化精神与文学史意义

居于汉地的色目人为其父祖立传，追述其族源历史，这本身就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化意义。王德渊在《薛昂夫诗集序》中说道：“薛超吾，字昂夫，其氏族为回鹘人，其名为蒙古人，其字为汉人。盖人之生世，封域不同，瓜瓞绵亘，而能氏不忘祖，孝也。仕元朝明圣之代，蒙元朝水土之恩，名不忘国，忠也。读中夏模范之书，免马牛襟裾之诮，字不忘师，智也。惟孝与忠智，根本立矣。”<sup>43</sup>这段话是色目人群体的写照。他们不忘祖，追溯血缘出身是孝；不忘国，为建立大元一统而努力是忠；读中原之书，传播中原文化是智。他们也和汉人一样，注重自己家族的历史，宣扬父祖功业，发扬家族传统，延续家族荣耀，应该说，这是色目家族移居汉地，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

色目人传记文的传主，有军事将领、各级官吏、文人雅士等，这几类人物身份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蒙古汗国时代，色目人主要是随蒙古人南征北战，多是军事将领。到了中期元世祖、成宗、武宗时期，更多的色目人投入到元朝的治理中，他们用儒术、行汉法，在学习治理汉地的过程中，接触汉人，学习汉文化，文化造诣不断提升。这一时期作为各级官吏与文人雅士的色目人开始增多。到了后期，色目人的日常不再是行军打仗，而是地方治理。随着居处汉地日久，频繁与汉人交往，很多色目人成为与汉人无异的文人雅士，与汉族文人诗文唱酬、雅集、题跋书画、编书赠序等，交往频繁，关系密切。这一时期作为文人雅士的色目人也最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元代色目人士人化的进程。<sup>44</sup>

元代色目人传记文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今天的读者可以从这一侧面认识元代各民族的文化认同。这些传记还形象地展示了西域各族融入蒙古帝国和元朝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与他族相处，接受中原文化洗礼而改变气质，终于舍弓马而事诗书。这种文化认同，从心灵深处、民族精神上改变着移居汉地的色目人及其家族。所有这些，只有在色目人物传记中才能真切感受。

从传记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元代色目人物传记的出现，拓展了传记文的写作内容，促使传记文体发生新变，展示出新的面貌。

#### （一）传记文内容的拓展

传记文作为叙写传主一生行实的文体，除了记录传主生平及其自身承载的文化意蕴之外，还涉及当时的历史图景、社会生活、人情礼俗、道德评判等多方面。

色目人来自西域，具有与汉人不同的族群归属、成长经历、思想观念。作者对色目人家世族望的书写，展示了元代各民族多元一体的状况；对色目人归附之事的详细书写，揭示了蒙元统一各部的过程；对色目人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书写，描绘了不同于汉人的人生画卷。这些内容的书写具有时代性与特殊性，这是以往的传记文所没有的。

除此之外，色目人的传记文中还记载了西域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如土土哈的传记文中写道：“有山曰玉理伯里，襟带二河，左曰押亦，右曰也的里。……其地去中国三万余里，夏夜极短，日暂没辄出。川原平衍，草木盛茂，土产宜马，富者有马至万计。俗衽金革，勇猛刚烈，盖风土使然。”<sup>45</sup>描绘玉理伯里（今伏尔加河流域附近）的自然景象、一马平川的草原景色与服饰风俗。燕只不花的传记文记录了辉和氏的风光：“辉和氏列城五，锡勒沁城尤岩峻，北连沙迹，南抚诸羌。”<sup>46</sup>亦都忽立的传记文写道：“西北人材率雄杰悍鸷，尚武而嗜杀，意者天地劲气攸萃耶？”<sup>47</sup>伯行的传记文说：“伊凉之西，沉鸷悍刚。挽强策良，乐其腾骧。”<sup>48</sup>三旦八的传记文说：“西夏人，自幼警悟，博达载籍，淹贯韬铃，善剑术骑射。”<sup>49</sup>这些都刻画了色目人勇猛善骑射的人物形象。《枢密句容武毅王》写到善制黑马奶的色目人：“其俗善刍牧，俾掌尚方马畜，岁时撞马潼以进，其色清彻，号黑马乳，因目其属曰哈刺赤，盖华言黑也。”<sup>50</sup>这些都是传记文中所记载的有关西域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风俗习惯。

色目人的传记文，无论是对其家世族望、归附之事、外貌特征与成长经历的记叙，还是对西域地区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的描绘，都丰富了传记文的写作内容，拓展了传记文的写作维度，增加了传记文新的质素。

#### （二）传记文文体的新变

元代潘昂霄的《金石例》是第一部专门研究碑志（刻）文体的专著，撰者“取古昔碑碣钟鼎之文，提纲举要，条分类聚，定为十卷，名曰《金石例》”<sup>51</sup>。卷一至卷五述碑碣铭志之起源、功能等，卷六至卷八以韩愈所撰碑志为例，提纲举要，条分类聚，说明碑志中家世、宗族、职名、妻子、安葬日月等的写法。书中归纳义例，总结做法、用语，标为程式，对于碑碣制度，碑刻文字的体式、做法做了详尽的归纳与揭示。元代杨本在《金石例序》中写道：“凡碑碣之制、始作之本、铭志之式、辞义之要，莫不仿古以为准，以其可法于天下后世，故曰例。”<sup>52</sup>应该说，在元代之前，传记文体已经形成了成熟的写作范式。元代色目人传记文也大体遵循这一范式，内容是叙述传主的家世、生卒、科名、仕履，兼及家庭、儿孙，或突出其事功，或表彰其德望。但为适应写作内容的需要，元代色目人传记文对这一范式也有突破。传记文文体的“发展和变化是在大众追求程式化和著名文学家追求创新的过程中不断演进的，范式的构建和突破是相辅相成的”<sup>53</sup>。《史》《汉》传记成就突出，唐宋文章大盛，在这样的文学史背景之下，元代传记作者为写好传记文，求新求变，破体求新，寻求新的突破。色目人作为新的传主类型的出现，本身就使传记文展现了新的风貌。为色目人作传，色目文化观念自然会带入传记文，使元代传记文在文化精神上也展现出不同于前代的特点。适应不同传主特点，采用不同写作手法，手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以奇文传奇人奇事，使传记文具有传奇意味。

## 结语

以元代色目人为传主的传记文，一方面，在内容上呈现出鲜明的异域特色，在形式上为适应独特内容而引入多种写作手法，展现出新的文章风貌；另一方面，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彰显了元代文人破体求新的文学追求、对元代多民族士人的文化认同及其所体现的大元气象。这在中国传记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存在，它给中国传记文学带来了新变。从内容，到写法，到风貌，以及体现的精神，都是独特的。

### 注释：

1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95页。

2(1)王恽：《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王恽全集汇校》卷五十一，杨亮、钟彦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377页。

3(2)阎复：《驸马高唐忠献王碑》，《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六五《碑志类·碑上二》，吴曾祺编纂，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年，第65页。

4(3)程钜夫：《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68页。

5(4)程钜夫：《秦国先墓碑》，《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第90页。

6(5)程钜夫：《大元河东郡公伯德公神道碑铭》，《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第214页。

7(6)黄潜：《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亦辇真公神道碑》，《黄潜集》卷二九，王颀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079页。

8(7)陆文圭：《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墙东类稿》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9(8)程钜夫：《赵氏先庙碑》，《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第59页。

10(9)许有壬：《大元赠光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赵国公阿塔海牙公神道碑铭并序》，《许有壬集》，傅瑛、

---

雷近芳校点，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63页。

11(10)宋濂：《元故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康里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卷五十一，黄灵庚编辑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193页。

12(11)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13(1)虞集：《高昌王世勋碑》，《虞集全集》，王颀校点，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15页。

14(2)阎复：《駙马高唐忠献王碑》，《涵芬楼古今文钞》卷六五《碑志类·碑上二》，吴曾祺编纂，第65页。

15(3)黄溍：《勅赐康里氏先莹碑》，《黄溍集》卷三二，王颀点校，第1174页。

16(4)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第150-151页。

17(1)程钜夫：《赵氏先庙碑》，《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第59页。

18(2)黄溍：《马氏世谱》，《黄溍集》卷十九，王颀点校，第725页。

19(3)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第151页。

20(4)欧阳玄：《元故翰林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贯公神道碑》，《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第103页。

21(5)吴澄：《元故浚州达鲁花赤赠中议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骑都尉追封魏郡伯墓碑》，《吴文正公集》卷三六，《元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558页。

22(6)瞻思：《元甘肃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荣禄大夫公神道碑》，李修生：《全元文》第3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34页。

23(7)虞集：《高昌王神道碑》，《虞集全集》，王颀校点，第1068页。

24(8)杨维桢：《故忠勇西夏侯迈公墓铭》，《东维子文集》卷二十四，《四部丛刊》影印本。

25(9)马祖常：《故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铭》，《马祖常集》，王媛校点，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242页。

26(10)程钜夫：《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第68页。

27(11)程钜夫：《秦国文靖公神道碑》，《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第93页。

28(12)黄溍：《勅赐康里氏先莹碑》，《黄溍集》卷三二，王颀点校，第1175页。

29(1)陆文圭：《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铭》，《墙东类稿》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 
- 30(2)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第 150 页。
- 31(3)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第 150 页。
- 32(4) 胡助：《达鲁花赤亦璘真儒林公去思碑铭》，《纯白斋类稿》卷十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181 页。
- 33(5) 胡助：《达鲁花赤亦璘真儒林公去思碑铭》，《纯白斋类稿》卷十九，第 181 页。
- 34(1) 乌斯道：《丁孝子传》，《乌斯道集》，徐永明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65—166 页。
- 35(2) 姚燧：《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谥武愍公李公家庙碑》，《姚燧集》，查洪德编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73 页。
- 36(3) 欧阳玄：《高昌偃氏家传》，《欧阳玄集》，魏崇武、刘建立校点，第 153 页。
- 37(1) 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程钜夫集》，张文澍校点，第 79 页。
- 38(2) 钱钟书：《管锥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72—273 页。
- 39(3) 黄溥：《广东道都转运盐使赠推诚守忠全节功臣资德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上护军追封高昌郡公谥忠愍合刺普华公神道碑》，《黄溥集》卷三〇，王颀点校，第 1093 页。
- 40(4) 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虞集全集》，王颀点校，第 1020—1021 页。
- 41(5) 虞集：《句容郡王世绩碑》，《虞集全集》，王颀点校，第 1021 页。
- 42(1) 宋濂：《元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江西等处行中书省丞相追封咸宁王谥忠肃星吉公神道碑铭》，《宋濂全集》卷五十四，黄灵庚编辑校点，第 1284 页。
- 43(2) 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 44(1) 参见李雪：《由碑志资料看元代色目人的土人化进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2 期，第 128—135 页。
- 45(2) 苏天爵：《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49—50 页。
- 46(3) 陆文圭：《中奉大夫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墓志士铭》，《墙东类稿》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 47(4) 刘壘：《中大夫延平路宣相杏林公墓志铭》，《水云村稿》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 48(5) 袁桷：《资善大夫资国院使赠资政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顺义郡公谥贞惠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并序》，《袁桷集校注》卷二十六，杨亮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第 1270 页。

- 
- 49(6)杨维桢：《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勋德碑》，《铁崖文集》卷二，明刊本。
- 50(7)苏天爵：《枢密句容武毅王》，《元朝名臣事略》，姚景安点校，第 50 页。
- 51(8)杨植翁：《金石例序》，潘昂霄：《金石例》，王水照：《历代文话》第 2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68 页。
- 52(1)杨本：《金石例序》，潘昂霄：《金石例》，王水照：《历代文话》第 2 册，第 1367 页。
- 53(2)孟国栋：《唐代墓志铭创作的程式化模式及其文学意义》，《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5 期，第 32 页。